

俄国版《光荣与梦想》

“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 欧洲的文艺史诗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下卷）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Илья Ильич
Горький



海南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下卷）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海南出版社

第四部

1. 好莱坞与革命的杂种 /3
2.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 /9
3. 1934 年：报道巴黎工人总罢工 /13
4. 1934 年：采访维也纳事件 /16
5. 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 /20
6. 莫斯科“民族”旅馆及奴隶心态 /24
7.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27
8. 建设与摧毁《一气干到底》/35
9. 斯大林想和我谈谈 /40
10. 收到带卐字形的匿名信 /44
11. 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 /48
12. 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 /52
13. 画布上的巴黎——法尔克的油画 /58
14. 不能容忍法西斯主义 /63
15. 最英明的导师和牺牲品 /67
16. 1936 年春，西班牙和巴黎 /74
17. 自任西班牙前线特派记者 /80
18. 在西班牙前线 /91
19.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 /97
20. 被射中的雄鹰——科利佐夫 /105
21. 马德里战时见闻 /109
22. 作家萨维奇当了记者 /116
23. 海明威，他虽死犹生 /119
24. 1937 年的堂吉珂德 /126
25. 作家将军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 /132
26. 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在炮火下召开 /137

目录 II

- 27 共和国军占领特鲁埃尔 /143
- 28 莫斯科：斯大林对作家作战 /147
- 29 西班牙：战争的结局 /155
- 30 忧郁和孤独使我重握诗笔 /165
- 31 《法国的悲哀》：慕尼黑挫伤了法国 /170
- 32 伟大的西班牙诗人马查多 /175
- 33 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周 /179
- 34 我被迫放下记者的工作 /185
- 35 奇怪的战争 /190
- 36 画家马尔凯也死了 /194
- 37 在巴黎：再次遭逮捕 /198
- 38 法西斯占领下的巴黎 /205
- 39 斯大林戏言《巴黎的陷落》 /210

第五部

- 1 德军入侵与书刊检查员的剪刀 /221
- 2 永远留在了前线的诗人拉宾 /232
- 3 在屠杀面前学会憎恨 /236
- 4 作家和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X光照射” /243
- 5 叛徒弗拉索夫 /252
- 6 为军报《红星报》工作的作家 /256
- 7 战士古德坚柯和他的诗 /261
- 8 流血的卡德里尔舞 /267
- 9 沉痛的1942年夏季 /273
- 10 勒热夫的战士与勒热夫的痛苦 /279
- 11 伟大的心灵和渺小的政治 /284
- 12 解放的库尔斯克：不屈的人们和苟且偷生者 /288

目录 III

13. 博学多才的外交官乌曼斯基 /295
14. 1943 年：深夜、深秋——深的战争 /299
15. 1943 年：第一次出现的不祥乌云 /309
16. 20 年代最聪明的作家之一——特尼扬诺夫 /314
17. 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趣事 /318
18. 明斯克包围圈：德军指挥官、作家巴甫连科、
幸存的人们 /324
19. 布洛克的笔与战争的口授 /331
20. 格罗斯曼头上的灾星：命运不喜欢最高纲领派 /337
21. 《黑书》和它的编著者 /341
22. 发现人的心灵：伊娜和她的日记 /347
23. 进军德国：欢乐中掺杂的悲哀 /354
24. 战争的最后几周 /363
25. 我认识的法国总理赫里欧 /368
26. 胜利之夜，我想着痛、勇气、爱情、忠诚 /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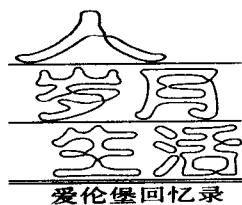
第六部

1. 1945 年 6 月：我开始了漫游 /381
2. 四个月访问七个国家 /390
3. 纽伦堡：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迹 /400
4. 《暴风雨》与反“卑躬屈膝”运动 /405
5. 美国之行：首次出击 /411
6. 美国之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415
7. 美国之行：黑人的命运 /422
8. 美国之行：会见爱因斯坦 /428
9. 美国之行：人们很激动，但海洋很平静 /433
10. 美国之行：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的命运 /439

目录 IV

11. 战后的法国：从痛苦中磨出面粉 /443
12. 马蒂斯为我画像 /448
13. 自白：“祖国只有一个” /452
14. 关于波兰的抒情的说明 /460
15. 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466
16. 巴黎：保卫和平代表大会 /475
17. 《人群》和斯洛伐克作家 /484
18. 法捷耶夫：不大为人所知的一面 /491
19. 意大利之旅 /498
20. 约里奥 - 居里：创伤和路标 /507
21. 斯德哥尔摩宣言 /514
22. 应邀与伊丽莎白王后谈话 /520
23. 在伦敦遭遇冷战气候 /528
24. 关于萨特 蘑菇和柳条筐的争论 /534
25. 画家孔恰洛夫斯基和红方块王子派 /542
26. 《九级浪》和担任最高苏维埃代表 /547
27. 去智利为诗人聂鲁达颁奖 /556
28. 中国之行印象记 /563
29. 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 /571
30. 两位杰出的外交家：李维诺夫和苏里茨 /576
31. 法国诗人艾吕雅 /582
32. 毫无生气的 1952 年。斯大林瘫了…… /589
33. 斯大林肖像：上帝？老板？ /595
34. 独往独来的伊夫·法奇 /602
35. 《解冻》：春天的开始 /609
36. 结语：分娩总是艰难的 /615

译后记 /624



第四部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1

好莱坞与革命的杂种

1933年我认识了美国电影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不久就和他成为挚友。他是一个很胖、很善良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便从比萨拉比亚到美国去寻找幸福；他受过穷，挨过饿，当过苦力、店员、流浪摄影师，最后成为电影导演。影片《西线无战事》给他带来了声誉和金钱，但他依然那么朴实、愉快，或者像巴别尔可能会说的那样，依然那么乐和。他喜爱俄罗斯的一切东西，没有忘记生动鲜明的南方话，每逢有人给他一小杯酒和一条鲱鱼，他总是很高兴。他来苏联呆了几个礼拜以后，立刻同我国的导演们交上了朋友，他说：“我不是什么刘易斯·迈尔斯通，我是基什尼奥夫的廖尼亚·米尔施泰因（基什尼奥夫是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都，迈尔斯通是在基什尼奥夫出生的犹太人）……”

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美国决定参战的时候，曾问过许多军人，问他们是愿到欧洲去呢还是愿留在美国，并编制了两份名单。迈尔斯通是想上前线去的，但那些想留在家里的人却被派到前线去了。迈尔斯通笑着补充了一句：“一般说来，生活中往往如此……”他是一个愉快的悲观主义者：“在好莱坞不能干你想干的事。但也许不仅在好莱坞是如此……”

他决定根据我过去写的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尔博夫的生与死》拍一部影片。我劝他别拍，我不喜欢这部旧作，而且在1933年表现一个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自发势力面前心惊胆战的浪漫的共产党员也颇为可笑。迈尔斯通却一定要我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他建议把故事情节改动一下，描写建设、五年计划：“让美国人看看俄国人的能耐……”

我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不是剧作家，未必能写出一个优秀的电影剧本，况且我觉得用几本书拼凑起来的东西也不像样子。但我喜欢迈尔斯通，于是同意和他一起试写一个电影剧本。

他邀我到英国的一个小小的疗养城市去，他在那里从事一件艰苦的工作——减肥。他体重100公斤，每年绝食3个礼拜，减轻20公斤；不用说，事后则狼吞虎咽，不久体重又复原了。为了绝食，他挑了一个附设蹯脚餐厅的舒适旅馆，以免对那些照旧享用午餐和晚餐的人们过于眼红。

他躺着，身体逐渐瘦了下去，而我却坐在旁边，吃着没有滋味的食品，写着电影剧本。迈尔斯通对场面的协调有令人惊叹的敏感：“这里应该中断……也许下过雨了？或者是一个拿着小筐子的老太婆正从家里出来？……”

我没有把这个电影剧本保存下来，我现在对它的印象已很模糊，它仿佛是

好莱坞和革命的一个杂种，是迈尔斯通的个别神来之笔和电影八股的一个混合物，是一出用两个成年人的讽刺点缀起来的传奇剧。

我们写满了厚厚的一本。迈尔斯通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十分宽松，末了我们便动身去巴黎。迈尔斯通在蒙帕纳斯认识了画家纳坦·阿尔特曼，便请他绘制布景和设计服装。

迈尔斯通的悲观主义原来是有根据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老板科恩在读电影剧本后说：“社会问题太多，性的描写太少。现在不是把钱乱扔的时候……”

不用说，迈尔斯通很不愉快，他为此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经他力争，终于使哥伦比亚公司把稿费付给了阿尔特曼和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我在巴黎遇见迈尔斯通。他没有变瘦，但变得忧郁了。战争期间，他在好莱坞拍了一部关于苏联人的影片：他想尽力帮助我们。我到了美国以后，和他通过电话，他邀我去好莱坞，但我却到南方去了。我不知道他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次被迫去干他不愿干的事。）

我和阿尔特曼都为这笔意外之财而眉开眼笑。当时的报纸登满了关于在一次国家举办的抽彩中各赢了五百万法郎的两个幸运儿的故事，一个是煤矿工，另一个是面包师。尽管我们发的财寒酸得无法跟他们相比，但我们还是把自己称作煤矿工和面包师。我们决定阔气地迎接1934年。

在埃科尔-德-梅台辛大街上有一家小小的波兰餐厅，由于想吃俄国菜，我们常去光顾。主人殷勤好客，那几年频频发生的波苏冲突也没有对点心或油炸圆包子的质量发生什么影响。波兰人在元旦的前夜关上自己餐厅的大门，来到了科坦登大街。我们的住宅有两个房间，所以便把房门敞开，把从餐厅里运来的十来张桌子排成一行。阿尔特曼在入口处写了一行醒目的艺术字：“煤矿工和面包师欢迎你们”。

现在我从旧照片上看见，当时我长得很胖，但是我并未变成一个像迈尔斯通那样温厚的人，恰巧相反，我急欲奔赴战场，向风车和某些完全真实的磨坊主进行冲击，刺伤奸细们和保罗·瓦莱里，猛烈攻击超现实主义和上个世纪俄国的写生画，无意中得罪一些人，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写各种抨击性的文章，往《消息报》寄发战地通讯。总而言之，我的行径与其说像一个稳重的42岁的散文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年轻的诗人。

我当时觉得，欧洲在1933年沉到了底，而现在则漂到表面上来了。在迎接新年的几天前，报上有消息说，莱比锡的法官们不得不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这是希特勒向舆论投降。我常常遇见德国侨民，他们说，法西斯制度的崩溃指日可待——这是他们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我认为，1934年对于希特勒将是注定灭亡的一年。

希特勒党徒的残忍和残暴引起了毫不妥协的精神和复仇的渴望。我还记得，匈牙利第一届革命政府首脑卡罗伊伯爵，一个罕见的好人，曾在“丁香田庄”咖啡馆里对我说：“您可知道，我现在盼望什么？夏天一个美好的早晨，我走上

凉台，喝着咖啡。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一面听，一面笑了。

我记得巴黎最初几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中的一次，郎之万教授、安德烈·纪德、瓦扬-古久里、马尔罗发表了演说。安德烈·纪德在布道——他证明只有共产主义能战胜邪恶，他常常喝水，眼镜的镜片闪闪发光。坐在大厅里的工人们从来没读过他的书，但知道他们面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当纪德说：“我怀着希望注视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都愉快地议论起来。马尔罗的演说艰涩难懂，他的脸不时因神经质的抽搐而变歪，突然他停住了，举起一个拳头叫道：“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去参加红军。”这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凡此种种如今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人也和时代一同变化，而且是按照不同方式变化的。在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们对他那五光十色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岁月的一致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今天就把昨天遮住了。

保罗·艾吕雅在1933年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坚定的信徒，当时未必有谁会预见到，反法西斯的游击队员们将反复吟咏他的诗篇。郎之万有一次曾忧虑地微笑着说，约里奥-居里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危险性。

安德烈·马尔罗现在是戴高乐政府的一名部长，而在那8年里，我在巴黎和西班牙经常遇见他，他是我的密友。有些回忆录的作者总是竭力中伤自己过去的朋友，这不合我的胃口。我已预先告诉读者，在谈到活人的时候，我要稍加节制，并对许多事情避而不谈。但不提马尔罗，我就无法谈30年代的事了。

他的长篇小说《人类生存的条件》于1933年问世，关于它我曾写道：“对历史的研究不仅用一批雕塑丰富了马尔罗，它还把任何一种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并已注定要灭亡的文化所富有的那种复杂性、那种必然的深度、那种极其复杂微妙的矛盾塞满了他的意识。”但是，我曾目睹马尔罗走向生机盎然的生活，而当一群极端保守的作家授予他龚古尔文学奖时我也感到高兴：局势在评奖委员会里起作用了——法兰西向左转了。

马尔罗给我介绍了许多年轻作家——卡苏、阿弗利纳、尼赞、达比。我和他的一个追随者吉乌成了朋友，一两年后他的《黑血》一书问世，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写成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他是布列塔尼的圣布里厄市的教师，并不像巴黎的文学家，他朴实、谦逊，没有非高谈一番哲理或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不可的愿望。（不久前我在罗马意外地遇见了吉乌，我们满怀柔情地回忆起遥远的岁月。）

我也常常遇见一些德国作家，我结识了温和而又调皮的布莱希特。他谈到死亡，谈到梅耶霍德的演出，谈到一些有趣的琐事。过去的水手图烈克很有把握地对我说，希特勒不出一年就要被扔进施普雷河。我很喜欢他的乐观主义，便送给他一只烟斗。托勒尔陷入了情网，他很绝望，既拟剧本的写作提纲，又拟解放德国的计划，看来他的衣袋里有好几副纸牌，他总是在盖纸糊似的房子。我一下子就对安娜·西格斯发生了好感，她任性，很活泼，眼睛近视，但洞察一切，虽然漫不经心，但对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理解得很透彻。

我们常常见面、争论、预测未来。有的人发誓说，不久法西斯主义即将在

德国崩溃，另一些人却断定褐色的鼠疫将波及法国。

不过颜色变了，法国的鼠疫是天蓝色的。我看见过“法兰西团结党”的几次示威游行，穿着蓝衬衣的年轻法西斯分子列队齐步行进，举手向自己的元首致敬。“战斗十字团”、“爱国青年团”的呼吁书开始闪现。与德国不同的是在法西斯分子中间工人很少，于是我带着冷笑打量着这些发誓要消灭所有共产党员的娇生惯养的子弟。

我打算春天回莫斯科。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定于夏季召开，我像第一次去参加舞会的姑娘那么激动，所有的作家都将欢聚一堂，并将开始一场关于艺术的坦率而严肃的谈话，这准是一桩大事……

我在1933年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巴格里茨基新写的几篇长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护照》、巴别尔新的短篇小说、谢尔文斯基和扎博洛茨基的诗。我觉得我国的文学正在蒸蒸日上。

许多法国作家在1933年怀着希望转向共产党人，这大概是由于千百万人在读到法西斯分子焚毁书籍、死刑、暴行的消息时产生了恐怖和愤怒。在革命作家联合会的呼吁书上签名的人中间还有季奥诺和德里耶·拉·罗舍尔。

我是在20年代末认识季奥诺的，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脸上经常挂着平静的笑容，写作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富有诗意的长篇小说。他在1933年和别的许多作家一起诅咒法西斯主义。后来我很久没有见到他，当我读了他的一篇主张顺从希特勒的文章后，我大为惊奇。而在他后来顺从了占领制度时，我对此已不感到惊奇了。

德里耶·拉·罗舍尔比他出色得多——才思横溢、有其独特的真诚，但患了很危险的精神病。我们曾一同在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文化大厦发言和友好地交谈。我在一次旅行结束后回到巴黎时，在圣日尔曼林荫道上的咖啡馆门口看见了德里耶。他急忙转过脸去。有人给了我一本他新近写的书，书中有一段奇怪的自白：“我们将同所有的人作战。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自由完蛋了。人应该陷入自己黑暗的深渊。这是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热爱自由的人现在说的话……”他迷上了法西斯主义，当希特勒党徒占领法国的时候，他曾和他们合作，而当他发现自己的打算失败了以后，就于1944年开枪自杀了。

天才的随笔作家，布列塔尼人，工人的儿子盖延诺常来出席我们的集会。我保存了他赠给我的《一个40岁的人的日记》一书，现在我把这本书打开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东方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光。它的反光正在帮助我们生活……我们没有效法他们的榜样。战斗没有扩展开去。现在我们看见，那场大火的火星如何在西方的泥潭里闪耀和隐没。但这场战斗、这个榜样却依然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希望、我们的全部喜悦……”

如今盖延诺是一位院士，不久前他到莫斯科来访问了我。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我们却满怀柔情地回忆起30年代中叶。

法国的法西斯分子在1933年末抬头了。巴黎宛如一个被骚扰了的养蜂场嗡嗡直响。人们在咖啡馆里、在地下铁路的车厢里、在街道的角落里争论得声嘶

力竭。家庭正在分裂，这在某一点上类似1917年夏天的莫斯科。

就连蒙帕纳斯的艺术家们也开始对政治发生了兴趣。我生平第一次迷上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匣子。康·亚·费定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在科坦登街上我的住宅里度过的一晚，在那天晚上，马尔罗曾向他详细打听苏联的情况，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同莱昂哈德·弗兰克（1882—1961，德国作家）争论了一番。我们常在“库波尔”酒吧间或我家里争论问题。

我有时遇见安德烈·尚松，他是一个热情的南方人，为人温和，心肠也好，但在谈话中却谴责所有对法西斯主义抱怀疑态度的人，他自称为“雅各宾党人”。现在他是院士，每隔5年或10年我们会见一次面，并且心平气和地回忆往事。

常到“库波尔”酒吧间去的还有奇列诺夫、埃尔扎·尤里耶夫娜、阿拉贡、德斯诺斯、罗哲·瓦扬、雷纳·克莱维尔以及其他一些过去的和现在的超现实主义。雷纳·克莱维尔有一双善良的、受迫害的人的眼睛，他为共产党人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不和感到十分痛苦，我企图安慰他，但未奏效。

《展望》周刊和《读书》的出版者，狂热的沃热尔有时候邀请我到非桑杰里的领地去。他是一个假绅士，但这不是就纲领而言，而是就天性而言——他本人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赞美苏联，和阿·阿·伊格纳季耶夫一同去过莫斯科，邀请共产党员前去看他，但当他的女儿玛丽-克洛特嫁给瓦扬-古久里以后，他却有些怅然。在非桑杰里经常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沃热尔喊得比谁都凶，他在生活中温柔敦厚，但发起议论来却激烈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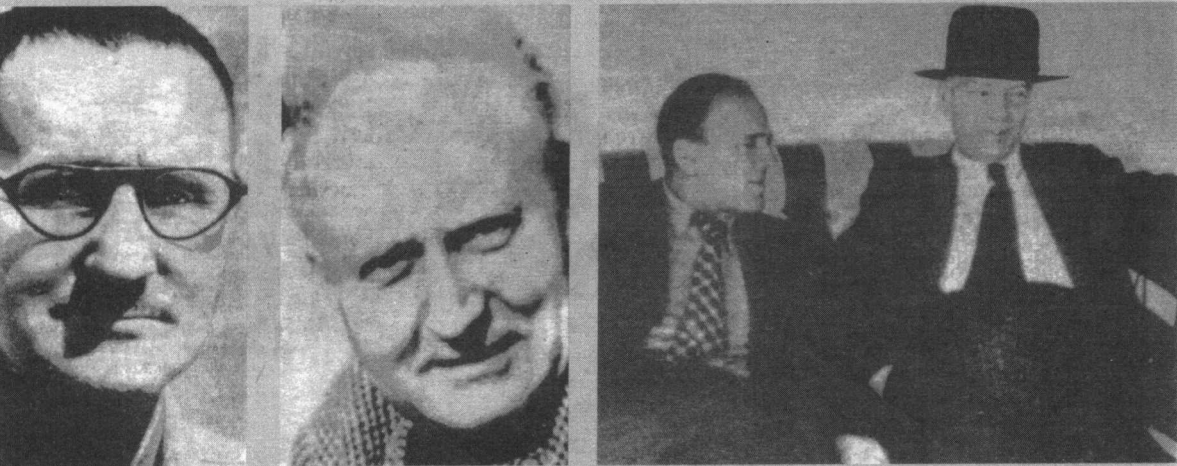
毋庸讳言，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与悲观的预言相反，《第二天》在莫斯科出版了。也许这件事在我对各种事件的评价上发生过影响。我一生中常常看到，私人事务、工作中的成败以至健康状况，往往会对人的见解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不管怎样，我满怀信心地瞻望着未来。

左：别利多里特·布莱希特。

中：让·季奥诺。

右：安德烈·尚松和乔·别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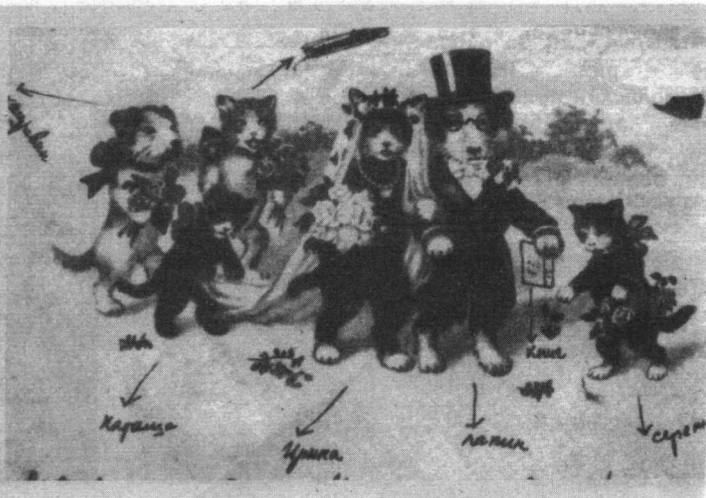
12月末，我收到从莫斯科拍来的一封电报：“我已与鲍里斯·拉宾结婚，姓氏与通讯处同前，祝新年快乐，伊琳娜。”我认识鲍·马·拉宾是在一年之前，他既爱书籍，又爱艰辛而危险的奇遇，这是不常见的，我因此很喜欢他，我也喜欢他写的那本书。但电报却使我吃了一惊：伊琳娜在给她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拉宾。我觉得电报中关于姓氏和通讯处的说明很滑稽——这既表现了伊琳娜的性格，也表现了时代的性格。

我们为伊琳娜的幸福干杯。除夕过得相当令人满意，这不仅因为波兰厨师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客人很多）都兴致勃勃，我们乐了一个通宵。我当时已近43岁，岁数不算小了，但想必还很年轻。我相信法西斯主义的垮台指日可待，相信正义的胜利、艺术的繁荣。我觉得过去的几年是一个过于漫长的前夜，于是就给由我在1932年至1933年间所写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书取名为《姗姗来迟的结局》。我不会说任何一句话来表白自己——我赞同过许多人的幻想，而且怎么也不能想象，我已渐老，却看不见结局。

我们为伊琳娜的幸福干杯。除夕过得相当令人满意，这不仅因为波兰厨师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客人很多）都兴致勃勃，我们乐了一个通宵。我当时已近43岁，岁数不算小了，但想必还很年轻。我相信法西斯主义的垮台指日可待，相信正义的胜利、艺术的繁荣。我觉得过去的几年是一个过于漫长的前夜，于是就给由我在1932年至1933年间所写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书取名为《姗姗来迟的结局》。我不会说任何一句话来表白自己——我赞同过许多人的幻想，而且怎么也不能想象，我已渐老，却看不见结局。

左：1934年，英雄吉米特洛夫在红场。

右：爱伦堡给伊琳娜结婚的搞笑贺卡。



2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

我同伊·阿·伊利夫和叶·彼·彼得罗夫是1932年在莫斯科相识的，但一年后他们到了巴黎我才和他们成为好友。当时，我们作家去国外旅行总要遇到许多预料不到的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乘苏联军舰到了意大利，本想乘原军舰回来，不料却跑到维也纳去了，他们希望在那里得到《12把椅子》的译本的稿费。他们从译者手中好不容易地弄到一点钱之后，便动身去巴黎。

我认识一位原籍俄国的女士，她在一家短命的影片公司工作，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人。我设法使她相信，写电影喜剧脚本的本领谁也比不上伊利夫和彼得罗夫，于是他们就得到了一笔预支款。

当然，我立刻便把煤矿工和面包师中彩的故事告诉了他们。他们每天问我：“关于我们的百万富翁，报上有什么新闻吗？”当谈到电影剧本的时候，彼得罗夫便说：“故事的开头有了，一个穷人中彩得了5百万……”

他们在旅馆里辛勤地写作，晚上便去“库波尔”酒吧间。我们在那里虚构各种各样滑稽的情节。除了剧本的两位作者之外，参加寻找“题材”的还有萨维奇、画家阿尔特曼、波兰建筑师谢尼奥尔和我。

剧本失败了，无论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怎样努力，剧本还是表明作者不很了解法国的生活。但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在巴黎住了一段时期。而我也有所收获，认识了两个极好的人。

在回忆录中，两个名字常常合写成“伊利夫彼得罗夫”，但他们彼此并不相像。伊利亚·阿诺尔多维奇腼腆、沉默，很少开玩笑，但开起玩笑来却很尖刻，而且，他和许多引得千万人发笑的作家——从果戈理到左琴科——一样，

爱伦堡、伊·伊利夫和叶·彼得洛夫。

也很忧郁。他在巴黎找到了早就离开敖德萨的弟弟。弟弟是画家，他对伊利夫大谈现代艺术如何奇特。伊利夫喜欢心灵的混乱和破产，彼得罗夫却喜欢舒适，他很容易和各式各样的人交友，常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自己和伊利夫发言，他能一连几小时逗人发笑，自己也跟着笑。他是一个少见的好人，他希望人们生活得更好，他能发现一切能使人们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的



事物。他大概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乐观的人，他十分希望一切都比实际情况更好。他在谈到一个明显的流氓时说：“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别去理会人们的流言飞语……”在希特勒分子进攻我国半年以前，彼得罗夫被派往德国。回来后他安慰我们说：“德国人极端厌恶战争……”

不，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并非形影不离，但他们共同写作，共同在世界上游荡，亲密无间。他们似乎是互相取长补短，伊利夫的尖刻讽刺对彼得罗夫的幽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调料。

尽管伊利夫比较沉默，但不知怎的却比彼得罗夫更引人注目。我真正了解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却晚得多，那是在战争时期。

我常想起苏联的讽刺作家左琴科、科利佐夫、埃尔德曼的遭遇。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却一直很走运，读者读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就立刻爱上了他们。他们的对头很少，也很少受到“严厉批评”。他们经常出国，游遍了美国；关于这次旅行，他们写了一本有趣而又富于见地的书。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他们写这部有关美国的书是在1936年；这也是一个成就：我们现在称之为“个人崇拜”的一切对讽刺是不大有利的。

他们两个人都死得很早，伊利夫在美国害了肺病，于1937年春去世，年仅39岁。彼得罗夫则因飞机失事，在靠近前线的地带牺牲了，年仅38岁。

伊利夫在去美国之前曾不止一次地说“剧目都演完了”或“浆果在萎谢”。但读了他的札记后可以看出，他刚刚走上一个作家的道路。他带着契洪杰（契诃夫在创作初期使用的笔名）的头衔死去了，有一次他对我说：“能够写出一篇像《醋栗》或《宝贝儿》那样的短篇小说该有多好……”他不仅是一位讽刺作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年轻的时候写过诗，但问题并不在这儿——他那日记体的札记充满着真正的诗意，既简洁，又严谨）。

“我们现在该怎样写作呢？”伊利夫最后一次到巴黎时曾对我说，“‘伟大的谋士们’（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合著的《12把椅子》中的人物的绰号）已销声匿迹。报上的小品文可以描写刚愎自用的官僚主义者、小偷、流氓。如果有姓名有住址，便是一种‘反常现象’。要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们立刻就大喊大叫：‘您把非典型现象普遍化了，这是诽谤……’”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有一次在巴黎讨论第三部长篇小说该写什么时，伊利夫忽然忧郁起来。“当真值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叶尼亚，您像往常那样想证明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错了，西伯利亚长着棕榈树……”

在大量手稿中，伊利夫毕竟留下了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的大纲。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一座城市里，人们不知为什么决定建设一座电影城，使它既“具古希腊之风，又有一切十全十美的美国技术设备。于是决定立即派遣两个考察团，一个去雅典，一个去好莱坞，然后可以说是综合经验并着手建筑”。去好莱坞的人们因为一名考察团员的遇难而得到了一笔保险赔偿金，竟变成了酒鬼。“他们在水深及膝的太平洋中游荡，美丽的晚霞照耀着他们油亮的醉脸。几个莫罗勒派教徒受阿姆之托抓住了他们”。出差去雅典的人境遇也不妙，钱很快就花光了。两个考察团在巴黎的“斯芬克斯”妓院相遇，他们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

生怕受惩罚。但是大家早把他们忘了，而且谁也不再打算建设电影城了……

他们没把长篇小说写出来，伊利夫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在札记本里写道：“这样严酷冰冷的春夜，心里又冷又怕，我真倒霉透顶。”

伊利夫去世后，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写道：“依我看，他最后的札记（它们是用打字机当即打下来的，打得很密，两行之间只隔一行）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富有诗意，又很忧郁。”

我也认为伊利夫的札记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文献，而且是优美的散文。他善于表达对庸俗的憎恨和惊讶：“我多么爱听职员们的谈话。女邮递员们安详而得意地论长议短，办公室里的职员们从容不迫地交流思想：‘甜菜是糖渍樱桃。’‘我们默默地坐在奥斯塔菲耶夫圆柱下面晒太阳。两个多钟头都很安静，突然路上出现一个散心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镀镍的铜壶，铜壶在阳光下亮得耀眼。大家都异常地活跃起来，您在哪儿买的？多少钱？’‘绿中带金的铅笔叫做“复写登录用笔”。啊！多么无聊！’‘一家新店开张了。香肠供给贫血症患者，野味馅饼供给神经衰弱症患者。’‘未受惊吓的白痴们的国度。’‘这是小负责干部的骄傲的子女。’‘“没有上帝！——可干酪还有吗？”教员担忧地问道。’”他描写了他熟悉的阶层：“作曲家无所事事，只会用五线谱的稿纸相互写告密信。”“每份杂志都咒骂扎罗夫。从前把他夸奖了10年，现在将骂他10年，骂他就因为从前夸奖了他。处在未受惊吓的白痴中间真叫人难过和苦闷。”

伊利夫的札记有些类似契诃夫的札记。但是伊利夫始终没有写出《宝贝儿》或《醋栗》来，来不及写，或者是由于谦虚没有决心写。

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痛苦地经受了这个损失，他不只是为自己的密友伤心——他明白，一个名叫伊利夫彼得罗夫的作者逝世了。1940年我们久别重逢时，他带着罕见的忧愁说道：“我应当重新开始一切……”

他可能写什么呢？很难猜测。他很有才气，有他自己的精神面貌。他没有来得及表现自己，战争就开始了。

他担任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当时主管往国外发布消息的苏联情报局的领导人是索·阿·洛佐夫斯基。我国的处境很艰难，许多盟国都在为我们唱挽歌。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洛佐夫斯基知道，在我国作家或新闻记者中间很少有人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也很少有人能不用引文和刻板公式为美国人写作。这样彼得罗夫就成了规模很大的报业通讯社“北美报业联盟”（即派海明威去西班牙的通讯社）的军事记者。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勇敢而耐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同时还给《消息报》和《红星报》写稿。

我们住在“莫斯科”旅馆里，那是战争开始后的头一个冬天。2月5号一天停电，电梯停了。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恰好在这个晚上从芬兰回来，他被爆炸的气浪震伤了。他向同伴们隐瞒了自己的情况，他勉强爬到了10楼。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说话很困难。请来了医生。他躺在病床上，情况很糟。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说话很困难。请来了医生。他躺在病床上，情况很糟。

在1942年6月十分艰苦的时期，我们坐在那个旅馆中乌克兰房间里。海军上将伊·斯·伊萨科夫来了，彼得罗夫请求他帮助自己请求他帮助自己。